

话本小说与诗词关系研究

梁冬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话本小说与诗词关系研究

梁冬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本小说与诗词关系研究 / 梁冬丽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161 - 3707 - 9

I. ①话… II. ①梁… III. ①话本小说—关系—诗词—研究—中国
IV. ①I207.419②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591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26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发现问题的深度与理论上的深度开掘

中国古典小说，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中成熟较晚。但当唐代传奇小说的体制一露头角，便展示出中国古典小说独具的民族特色。其中叙事语言的文言化和小说叙事中的诗词引用这两个特色为学者们关注——前者，直接导致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分野：用文言文叙事者，属文言体小说，而后出现的用白话文叙事者，属白话小说。后者，则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中同时存在，以至小说叙事中“引入诗词”成为中国古典小说（无论文言抑或白话）的标志性叙事模式，甚至成为中国古典小说文体显著的中国特色。

对于古典小说叙事中“引入诗词”，学界历来褒贬不一。贬之者，大抵以西方小说叙事理论为轨范，将小说叙事与诗词抒情对立起来，认为古典小说引入诗词为大弊；褒之者，则往往只是从诗词如何在小说中发挥其固有功能、并在小说叙事中产生特殊效应等视角进行研究和评判。众说纷纭。梁冬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独具慧眼，特将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话本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将视域聚焦在话本小说与诗词的“关系”上。力图在二者“关系”的研究中，寻释前人未曾涉及的、有关话本小说引入诗词的文体生成的原生态流程，并由此为起点，洞察该流程的演化、变异、流播、转型、回归等一系列文体发展的自身逻辑。这种在动态中对于历史遗存的辨析、甄别，使得有关文献在论题逐步开展与深入的过程中成为活色生香的、有序的外在系统结构——表现出作者缜密的科学思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当然，也为整部著述的理论，提供出系统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献证据。

作者研究目的非常明确：分别从文体特征、创作方式、叙事方式各

2 话本小说与诗词关系研究

角度展开研究,系统、全面地阐释话本小说引入诗词的艺术特征及其效果,尽量“进入过程”,透视话本小说与引入诗词的关系的历史进程。牢牢抓住三条衡量尺度:一是话本小说作为“话本小说”这一文体的独特性;二是话本小说编创方式的演变;三是话本小说的叙事方式。从而对话本小说体制演化、编创方式、叙事方式、叙事模式转变、文本变易与引入诗词的关系作全面的考察,可谓牵牛得鼻。

该著论述过程始终以话本小说体制为中心展开,以叙事方式为重点,以编创方式为难点,以文本变易为流传研究,其中每一章均以话本小说发展各阶段的演进过程、特点为中心考察话本小说与引入诗词的互动关系。如第一章专章探讨话本小说体制演化与引入诗词的关系。指出:诗歌偶然入子史之书的方式成为叙事性散文引入抒情性诗歌的最早形式,不过比较稚嫩。唐代俗讲、变文散韵结合的体制是话本小说体制形成的直接渊源。本事诗、诗话的“诗”与“事”之间的内在构成关系是话本小说编创时组合“诗”与“事”关系的范本。使人信服地彰显出中国古典小说中“有诗为证”的文本前源。尔后,以宋元话本为依据,条述“有诗为证”在话本体制的逐渐成熟中趋于程式化与规范化。但到了明末清初,拟话本体制的“分回”及“中篇化”,“体制压缩”及“笔记化”,使得话本小说引入诗词的程式发生结构性改变,诗词引入量明显减少,同时出现小说编创者自撰诗词增多、套语减少的现象。很显然,作者在辨析话本小说“有诗为证”之特征时,一开始就找准了两条纲绳:一是话本小说自身发生、发展、成熟、演变的线索;二是中国古典诗歌与叙事散文相互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包容而又各守家门、融通发展的历史线索。这,正是该著总论立论的基本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已经昭示出著者能够超越前辈,独辟蹊径,自发奇响——因为作者站到了发现问题、辨析原委、作出结论的制高点上。

由于这种辩证的历史眼光,遂使得其后几章的论述,亦紧扣历时性的线索,竭力从历史源头逐渐往下伸展探究的触角;横向则笼括共时性历史遗存,巨细无遗,细辨细考,娓娓道来。如第三章专论“话本小说叙事方式与诗词的引入”,这是该著的重点,也是作者展开论述的难点。之前尚无学者探讨过这个问题。

第一节谈“抒情性诗赋如何融入叙事性小说”，便直追“诗骚”和“史传”之源。这很有必要。实际上，中国古典小说的“有诗为证”，正是源于中国学术启蒙阶段特重诗学传统的缘故。“诗”乃中国文统的主脉。大家习惯上喜欢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没说中国是一个“文的国度”，就最为平凡地道出了这个事实。《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第十三章云：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先学诗，而后能言”的为学信条。那么，“史传”正是史家“立言”之书，其中叙述言事，当然就必须引诗作为自己“博学”的证据和“能言”的执照。于是在小说“能言”的叙事中，动辄“以诗为证”亦自成一种定格。特别是中国古代小说，其源头又大数出于“史传”，故唐人小说名之曰“传奇”和“讲史”。既然“史传”之与诗有如此渊源，那么后来小说往往“以诗为证”作为固有程式，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可贵的是，著者并未仅仅停留在对于中国叙事的“诗人”传统再去做深入剖析，而是扣紧文学体式所呈现的“诗人叙事”这一学理性现象，分别从雅化文学之赋体被小说引入与转用，民间俗词、曲子被小说家化用，以及诗词曲赋中属“艳情与体貌描写”之内容者被小说引入与消化的具体实例，考辨抒情文体是如何融入叙事性小说的。接下，继续以话本小说为例详论赋赞多用于描写抒情，近体诗多用于评论，签词偈语则多用于情节设置，这种“抒情诗词赋”“进入小说叙事”的特殊功能，得出“诗词成为生发故事的结构核或线索”，而“预兆型诗词是设置悬念的重要手段”等结论。均以原创或改编之话本为依据，中肯稳妥。

第四章实际上是第三章未完话题的拓展。围绕“话本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诗词引入”的关系而伸延。话本这种叙事模式的变化，著者也是从史的线索来进行梳理：“宋元话本，为说话念诵需要，以描述型诗词为主；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为案头出版需要，以评议型诗词为主；清中叶以后，拟话本小说为满足抒写编创者人生理想、发表对社

会现状不满的需要，以引入俗化了的议论型诗词为主；即使有为满足情节需要的诗词，也是向才子佳人小说诗词唱和的风气靠拢，回复明前中期传奇小说的叙述模式，数量庞大的诗词隔断了叙事的流线发展，整体上来说，话本小说故事情节弱化。”但话本小说作者为了“补史征实”的需要，在叙述中反而又增加了“用于议论的诗词”。这么客观地对于论题所涉及视域的全面观照，以及正反考察，正是该著所提出问题和所下结论处处显得平实而又不乏新见的主要根源。其间由“有‘我’无‘诗’”而论及“叙述者、叙述视角的转型”一节，尤能新人耳目。

细读该著，读者还可以发现：著者在对于话本“史”的线索（小说历史遗存文本以及历代学人的评价体系）进行研究、甄别和考识而得出独自见解时，往往还留意着对于“人”的研究视角和论述线索——也即注意了从编创者、传播者（说书人、书商）和接受者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去探析引入诗词与话本小说创作叙事模式的改变。这就使得论题具备了多维视角：不仅仅是在谈小说文本，而是在对作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消费市场以及文化商品受众接收心态等进行全方位的立体观照。如第五章开篇即指出：文本变易是由话本小说编创、传播过程的特殊性所致。通俗小说基本上经历过世代累积的编创历程，世代累积过程中，如果遇上天才文人参与改编，才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伟大的著作，如通常所说的四大奇书。模仿，是中国通俗小说编创过程的历史选择。“三言”、“二拍”即得冯梦龙与凌濛初之力整理、编辑、模拟、创作，才能在即将散失殆尽的时候重新繁荣，一直流传。续书、仿书、翻案小说、选本也是中国通俗小说创作与传播、影响过程中存在的一大特色。因此，同一题材，同一故事，往往被改编、翻新，形成新著作或者新文体，继续为读者接受与欣赏。话本小说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不像章回体小说一样，以续书、仿作为主，而是以选本为主，兼及改编、海外翻案等形式。文本变易时，除了情节、主题发生变异外，作为话本小说体制象征性标志的诗词引入也不可避免发生变化。”著者在论毕“民间俗词曲子之化用”后又说：“为什么为市井细民服务的‘说话’、‘话本小说’引入如此大量的诗赋，既不为编创者舍弃，也不为听众（读者）抛弃。因为这是来自他们自身生活的语言、文学与

心声。”

小说引入诗词，本来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是一个老话题了。但这个老话题被梁冬丽洋洋洒洒谈得如此有根有蒂，新见叠出，我觉得真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面，是有扎实的功夫在的，是有含辛茹苦的艰辛在的，是有作者在博观约取中独到的敏锐思维在的。非博览群籍者不能如是，非熟读原著者不能如是，非谙熟中国古代小说历史者不能如是，非高屋建瓴、纵横捭阖、深思熟虑者不能如是。梁冬丽是了。如是为学者。祝贺！从心底里庆贺该书出版！

是为序。

沈家庄

二〇一三年八月五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话本小说体制演化与诗词的引入	(7)
第一节 话本小说体制前源的诗词引入	(8)
第二节 宋元话本体制确立与“有诗为证”的程式化	(30)
第三节 明末拟话本体制完善与引诗的成熟	(38)
第四节 明末清初拟话本体制变异与引诗的失范	(47)
第二章 话本小说编创方式与诗词的引入	(62)
第一节 程式化:据事改编宋元话本的诗词引入	(64)
第二节 整饬化:改编向独创过渡拟话本的诗词引入	(104)
第三节 个性化:独创话本小说的诗词引入	(126)
第三章 话本小说叙事方式与诗词的引入	(142)
第一节 抒情性诗赋如何融入叙事性小说	(143)
第二节 多赋赞:用于描写、抒情	(157)
第三节 多近体诗:用于评论	(179)
第四节 多签词偈语:用于情节设置	(189)
第四章 话本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诗词的引入	(214)
第一节 叙事模式转型时诗词引入的趋势	(215)
第二节 内引诗词增加与模式化情节	(228)

2 话本小说与诗词关系研究

第三节 外引诗词缺失与叙事笔记化回归	(245)
第五章 话本小说文本变易与诗词的引入	(258)
第一节 随意删削:选本的诗词引入	(258)
第二节 各行其是:同题改编的诗词引入	(270)
第三节 不可复制的“有诗为证”:海外翻案的诗词引入	(288)
结语	(300)
主要参考文献	(304)
附录1 明代话本、拟话本小说	(312)
附录2 清代拟话本小说	(314)
附录3 话本小说诗词体裁、数量	(317)
后记	(320)

绪 论

中国古典小说既是上层文士茶余饭后谈资或游戏笔墨的重要对象，也是普通百姓劳动之后休息时消遣的重要娱乐形式。小说文体随时易迁而定义不同，类型众多，流派纷呈。小说文体自唐代获得独立以来，最主要的文体特征是“文备众体”，而小说与“众体”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有诗为证”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与其他民族小说区别最大的特征之一。本书就试图以话本小说为切入点，通过研究话本小说与所引入诗词的关系来探讨中国古典小说“有诗为证”形式的形成、发展、壮大过程，并考察这种特质如何成为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小说文体特征。

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强调，影响小说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是“史传”与“诗骚”。但是随着近代西方叙事理论与小说观念的传入，“有诗为证”这种文学现象受到激烈的批判，特别是在“小说界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诗骚”的热情在消减，“文非文，史非史”的政论小说创作形成大观。幸好进入 21 世纪以来，不少研究者意识到不能完全使用西方的叙事理论和小说观念来评价、批判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而要重新审视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特点。中国古典小说有自身的叙事理论与审美价值，应该从“中国古典小说民族特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各种现象与特征，如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的演变、与戏曲同源异流的交叉现象、与民间说唱的交流互动关系、情节结构的原生态等，都是构成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小说不同的民族特质。

中国古典小说与引入诗词的关系在此研究风气下，也提上了日程，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总括起来，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为著名小说卷中诗词做鉴赏工作；二是研究小说卷中诗词的价值、作用、意义、地位、弊端等；三是从总体上论述小说与诗词的关系。主要成果有：

2 话本小说与诗词关系研究

- (1) 刘耕路:《红楼梦诗词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 (2) 孟昭连:《金瓶梅诗词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 (3) 陈东有:《金瓶梅诗词文化鉴赏》,巴蜀书社1993年版。
- (4) 郑铁生:《三国演义诗词鉴赏》,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 (5) 吕树坤:《著名古典小说诗词赏析》,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 (6)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修订重排本)》,中华书局2005年版。
- (7) 林辰等:《古代小说与诗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 (8) 崔际银:《诗与唐人小说》,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 (9) 牛贵琥:《古代小说与诗词》,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10) 邱昌员:《诗与唐代言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 (11) 吴怀东:《唐诗与传奇的生成》,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12) 李志艳:《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话语的诗性特征——以四大名著叙事话语中的诗歌为例》,巴蜀书社2009年版。

从上列诸作可以看到,《诗与唐人小说》、《诗与唐代言小说研究》、《唐诗与传奇的生成》等解决了中国最早的小说独立文体——唐传奇与诗的关系。也就是说,《诗与唐人小说》等比较妥善地解决了文言系统小说与诗之间的关系。然而,却没有回答通俗小说与诗词的关系问题。于是,在“诗骚”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研究这方面,就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但由于问题比较复杂,故迟迟没有得到学者们充分的开发。

近年来情况有了一些转变,表现之一是研究通俗小说与韵文(诗词)之间的关系方面开始成为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热门^①,研究

^① 孙步忠:《古代白话小说中的诗词韵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2年;张育红:《〈水浒传〉韵文初探》,首都师范大学,2003年;李晓芳:《石蕴玉而山晖 水怀珠而川媚——论诗词在〈红楼梦〉诗化风格中的作用》,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郭伟宏:《才子佳人小说与诗词》,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05年;赵鹏:《水浒传中韵文的地位和作用》,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颜鸽:《论明初章回小说中韵文框架的形成——以罗贯中三部作品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皮芳芳:《韵文的叙事功能及其对通俗小说叙事艺术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6年;蒋伟:《宋元小说家话本中的词研究》,硕士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仅郭伟宏与皮芳芳论文以小说作为立足点,而其他论文都是以“诗、词”等韵文为立足点。

也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果。

话本小说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通俗小说流派且唯一以形式为划分标准的流派,“有诗为证”现象更突出,因此在论述话本小说动辄“有诗为证”这一现象时,要还原到历史中去,还原到话本小说文体的本质特性中去,不能仅仅以今日之眼光和视角去评价和衡量古代某种流行且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文学范式,更不能拿西方审美趣味来评价中华民族的审美爱好。此外,文体学研究方兴未艾,小说文体研究也成了显学之一。此类研究从理论上为进一步研究话本小说“诗骚”传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书确立“话本小说与诗词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以往探讨的“话本小说中的诗词”,笔者的立足点是话本小说,非以往的“诗词”,这一点须明确。以往的研究成果是本书研究的基础,力求在此基础上深入一层、更进一步,并从多角度来观察研究。

本书所说的“话本小说”,包括有话本以来的话本小说与拟话本小说。话本小说体制主要由题目、篇首诗词、入话、头回、正话与篇尾诗词这六部分组成。其中,头回有故事性;入话没有故事性,多是解释、议论性文字,这时候入话与头回是可以分清楚的。可是随着体制的变革,一些话本小说的头回故事性削弱,夹叙夹议,带入话倾向,这时候头回与入话便很难分清楚;随着体制的变革,入话解释、议论时也多插入缩写或者概括的故事典故,这时候也很难分清楚是入话还是头回。故此,下面论述过程中将“入话”与“头回”两个词语明确分开论述或统计的,就意味着所论及之话本小说头回与入话可分清楚,如果用“入话与头回”、“入话(头回)”或“头回(入话)”等词语的,就意味着所论及的话本小说的入话与头回较难分清楚,只能这样笼统称呼。话本小说具体篇目与数量将参考《古本小说集成》、《古本小说丛刊》、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以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综合而定。

据程毅中先生所辑《宋元小说家话本集》,宋元话本主要有40篇:

《红白蜘蛛》、《三现身》、《山亭儿》、《杨温拦路虎传》、《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定山三怪》、《错斩崔宁》、《种瓜张老》、《西湖三塔记》、《简帖和尚》、《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合同文字记》、《风月瑞仙亭》、《快嘴李翠莲记》、《洛阳三怪记》、《张子房慕道记》、《阴鹭积善》、《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刎颈鸳鸯会》、《花灯轿莲女成佛记》、《曹伯明错勘赃记》、《错认尸》、《老冯唐直谏汉文帝》、《夔关姚卜吊诸葛》、《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传》、《赵旭遇仁宗传》、《史弘肇传》、《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金鳗记》、《勘靴儿》、《陈可常端阳仙化》、《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俞仲举题诗遇上皇》、《皂角林大王假形》、《福禄寿三星度世》、《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明清两代的话本小说与拟话本小说除《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外，约71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话本小说为通俗文学，文字使用不像高雅的主流文学那样严谨，在印刷、传抄过程中常用俗字、异体字、同音字、同义字等，如“飞”往往作“非”，“娥”与“蛾”混用，“叫”与“教”互用，词牌“御街行”作“御阶（堦）行”，等等。又因为话本小说往往有文字素材，经改编之后，姓名、情节以及一些细节与原著往往有些出入，如《情史》作“陈寿”，大病三年，而《醒世恒言》卷9《陈多寿生死夫妻》作“陈多寿”，大病十年；又如原素材作“韩师厚”，话本小说作“韩思厚”，等等。引用原文时依据原文全录，不作修改。

所谓“诗词”，这里指话本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话本小说中出现的所有韵语，是话本小说中韵文的统称，下面行文时为简便，亦将“话本小说诗词”称为“诗词”。由于曲、小曲、对句、俗谚语、对联、谜语等功能与诗、词等韵语大致相同，也纳入本书的考察范围，成为研究对象。还要明确指出，话本小说诗词不是唐诗、宋词那样的文人诗词，但是又与唐诗、宋词这样的文人诗词有一定联系。林辰等在《古代小说与诗词》一书里说：

小说诗词毕竟不同于文人诗词。小说诗词是作为小说创作的一种工具被引进小说中来的——所以，小说诗词虽然还保存着诗词曲赋的外形，却已经是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成为小说的一种表现手段，成为小说的一种艺术技法了。^①

这说明小说诗词与文人诗词不同，不过小说诗词依然保留着文人诗词的外形，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该书后面又进一步说明，小说诗词在地位上从属于小说的局部或整体，其作用是服务于小说故事情节，用以描写、议论、抒情。当文人诗词被引入小说之后，因其从属性而被俗化与简化，只剩下“诗词”的外壳，因此，不能用文人的标准去衡量小说诗词的艺术成就。话本小说诗词也从属于话本小说的局部或整体，是话本小说叙述故事的艺术手段之一；为话本小说人物故事情节服务，是散文叙述时进行描写、议论、抒情不可缺少有效控制手段，同时其体裁与形式依然保留着文人诗词的外壳与形貌，成为适合话本小说叙述需要的俗化、简化了的“诗词”。因此，下面各章具体论述话本小说与诗词的关系时，均不适宜以文人诗词之体式、成就去衡量、评价、判断话本小说诗词。

一般来说，话本小说用诗的情形有两种：外引与内引。外引是指以“诗曰”、“有诗为证”、“正是”等前导语引出的诗词，如篇首诗词、篇尾诗词，以及正文中间评价人物事件时使用的诗词。内引是指以话本小说中以人物的口吻引出的诗词，包括人物题诗、赠答、联吟、弹唱等各种情形。

还要指出的是，对话本小说诗词进行定量统计时，还是以文人诗词的体式来划分“七绝”、“七律”等类别，不过由于仅存外壳、形貌，加上话本小说诗体复杂错乱，可能在统计过程中将某些“四不像”之诗体就近分配到某个类别，故此，论证过程中的“分体”统计只能作为参考数据。下文论述时，一般情况下称“诗词”，包括话

^① 林辰、钟离叔：《古代小说与诗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6 话本小说与诗词关系研究

本小说中出现的所有韵文体裁，这时候“诗词”是指与话本小说中散文相对的“韵文”；但间或把“诗词”与“赋赞”并提，这时候“诗词”是指诗体与词体韵文，而“赋赞”是指赋、赞等较长的韵文。前者针对韵散相间而言，后者针对话本小说中诗体不同而言。

第一章

话本小说体制演化与诗词的引入

话本小说作为以形式为标准划分的小小说流派，有其自身独特的体制特征。鲁迅《坟·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一文认为，要成为话本小说，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必要条件：一是须讲近世事；二是须有“得胜头回”；三是须引证诗词。^①“须讲近世事”是内容题材，不属于体制研究的范围^②；“得胜头回”正是其篇章结构的特征之一，应该归入体制研究的范畴；话本小说“开篇引首，中间铺叙与证明，临末断结咏叹，无不征引诗词，似乎此举也就是小说的一样必要条件”^③，所以“须引证诗词”是体制考察的对象。综合上述看法，话本小说的体制特征如下：白话而短篇、以散文为主辅以韵文、起结模式化、模拟说书人口吻。“白话而短篇”，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末以后，话本小说体制有向中篇化行进的，也有向笔记化回归的；“以散文为主辅以韵文”，这点与敦煌变文、章回小说、传奇小说等相类，话本小说不是独一无二的小说类型；“起结模式化”，即篇首篇尾诗词、入话与头回诸制，也与时俱进；“模拟说书人口吻”，章回体小说也是这样做的，为二者共有特征。事实上，讨论话本小说体制特征的独特性，应该重点讨论是否有头回与是否引用了诗词。考察体制的形成、成熟、变异，也多从头回

① 鲁迅：《坟·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8页。

② 鲁迅主要是考察《京本通俗小说》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话本小说“须讲近世事”的结论本身也有待深究。

③ 鲁迅：《坟·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7—38页。